

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

徐雁 王燕均 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徐雁 王燕均主编

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

四川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 彭静中

封面设计 冯先洁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

徐 雁 主编
王雁均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44 字数 600 千

1990 年 7 月第一版

199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614-0246-5/G·20 定价: 5.10 元

全面展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

(代序)

徐 雁

在历史中国，中国藏书的发展历史，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历史社会的烙印。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无不影响于中国历史藏书的兴衰隆污；而自然经济的历史变迁、文化学术的时代盛衰，也无不同中国历史藏书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国历史藏书，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社会生活的全面了解，也有助于学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完整认识。正如现代史学家吴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在1933年《江苏藏书家小史》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

除了中国藏书事业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历史社会的烙印外，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烙印。完全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历史藏书活动的从史实纪录到编集总结、到专题研究的历史藏书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同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的藏书事业毕竟是在中国历史社会的土壤里成长发展起来的，它不能不深深地打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烙印。

然而无疑地，中国藏书史研究方法的发展进步节奏毕竟是相

当缓慢的。以中国封建藏书史而言，从《汉书·艺文志》序对周秦以来官府藏书历史的记叙开始，到《经籍会通》卷四对明代书业史料的结撰，中国历史藏书的史实记录的方法竟沿袭了整整十六个世纪！而作为经验科学总结和藏书史料编集的阶段又继续了从明季到晚清的近三百年。至于对中国历史藏书的专题研究，则是以清末民初学者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缘聚，江苏长洲人）着手长他的巨著《藏书纪事诗》（1897年《灵鹫阁丛书》六卷本）的编撰为发端的。换言之，中国历史藏书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此前约十九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藏书的史料工作，几乎只有史料的积累而无史论的突破，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飞跃。它们并没有从历史中国的经济、文化、学术背景上，来考察各种历史事象同中国历史藏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列宁《卡尔·马克思》），其成果同发达的中国历史藏书事业、丰富的藏书文献史料对文化学术史的卓越贡献等事实殊不相称。

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序言》）事实上，有了历史，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载体——书。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在《知识的水库——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一篇中这样叙述：“文字是记载人类思想活动的工具。人类文化进展到某一程度时，就得靠文字记载来保存活动的内容。当记载人类活动内容的文献，多到某一限度时，文献整理与保藏的问题也就跟着（着）产生。”（《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从而阐明了中国历史藏书活动发生发展的原始条件。至于“三代方策，遐哉邈矣”（《藏书纪事诗》王颂蔚序）、“纪事多用竹木，纪功专用金石”（《书林清话》卷一）说的无非都是上古时代文献记载的概况。历经诸子百家的争鸣、挟书之律的废除，中国历史藏书才真正进入了坎坷发展然而又是日益发达的历史轨道。然后，又是几百年过去了，纸张的发明，雕版的应

用，使书业中活动有了“笺素之约”和“剞劂之便”（《文海披沙》卷四），中国历史藏书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阶段。从此，皇家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作为中国历史藏书事业的主系统，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途径地作用着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发展发达，同历史中国社会发生了更加千丝万缕的联系。

开展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如前所述，曾经历了一个长达三百年的编集总结的中介阶段。这是很必需的，因为前人长期的史实记录，是一堆极其珍贵的遗产，蕴藏着尚未开发然而又是极为丰富的史料资源；而要对中国历史藏书的各个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离开了它们，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史实记录往往存在不少缺陷，犹如梁启超在批评上古史书时所指出的那样：“……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因此，编集藏书史料的工作成为必要。

在近三百年的编集总结阶段，明清两代的学者们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些可资利用的文献集，它们是张萱辑的《西园闻见录·藏书》，郑元庆、范锴同辑的《吴兴藏书录》，丁申编的《武林藏书录》等。当然藏书史料的编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并未因此而终结。在现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尚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李希泌、张叔华同编，1965年结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历代图书馆学名著选》（袁咏秋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资料汇辑》（范凤书辑，1987年结集，稿本）、《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徐雁、谭华军整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至于本部《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也是在新的意义上对历史资料的整理、编撰。我们在这里举出这些成例，只是想实证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明代以来，学者们在历史藏书学的方法论方面已

经确立了一种可贵的“集中编纂史料”的思想。相对于过去长期的史实记录，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对藏书经验的总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我们知道，随着雕版印书技术的发展，书业活动的活跃，以及随之而来的藏书事业的兴盛，关于藏书的学问也日益为人们注意。尤其是经过北宋、南宋两代的藏书实践，藏书的意义已日益为帝王和士人所重视，且在封建王朝政体内部、书院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藏书传统”，在某些经济、教育、文化俱有条件的地区，如北宋的四川、江西和南宋的浙江、福建的某些中心区域，也业已形成一种“藏书风气”。这些因素，使皇家、书院、私家藏书事业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的事业。而同时，根据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藏书事业而言，“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古经典籍聚散考》第三卷第二章）伴随着藏书条件的大量具备和藏书活动的普遍活跃，有关藏书事业的图书访求、整理入藏、编目分类、庋藏保管、传承传播等“措理之术”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尽管祁承燾、孙庆增、丁雄飞和叶德辉撰写《淡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古欢社约》、《藏书十约》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向当时的藏书界宣传自己的藏书“措理之术”，但客观上，这些总结藏书经验的著作流传所及，恰是传播了他们的藏书经验，并对藏书事业发生积极的影响。以研究的眼光看，它们也必然分别融会了明中叶、明季清初和晚清同时代的一些藏书家的经验进而结撰成书的，因此是研究中国私家藏书的难得的实录。

此外，伴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发达，记录着皇家、私家和书院藏书事实的各种“艺文志序”、“经籍志序”、“藏书记”、“书目序”、“藏书志序”等文献也在汉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大量产生。它们的代表作有班固《汉书·艺文志》序、《隋书·经籍志》序、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张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后序等等，分别见于各代的正史、文集、方志、书目，具有面广、

量大、针对性强的优点，从而为后世保存了关于当日藏书的历史概貌和具体资料，成为别一种的有效的史料积累，因而也是研究历史藏书的重要依据。

以上三个方面是近代和现代学者的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活动所赖以存在和深入的主要史料资源。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藏书方面的论著，在思想观点上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提供着启发。它们有郑樵的《校雠略》、曹溶的《流通古书约》、邱浚的《论图谱之储》、周永年的《儒藏说约》和刘音的《广儒藏说》等，成为我们研究封建时代藏书思想的珍贵资料。

经过这近三百年的史料编集和史实总结，凭借着近十六个世纪史料的积累，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终于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而肇其研究之端的，便是清末民初学者叶昌炽。

作为清季一位既有素养又有成就的学者，叶昌炽始终沐浴着江南人文圈的光辉。他生于素有“藏书之乡”美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因此深受“因士类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后生文词动师古昔”（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一引）这种文化环境和“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牖充栋、琳琅满目”（《苏州史话》第二十二篇引）这种藏书传统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便建立了对文献事业的爱好。出于对前辈藏书家，尤其是乡先辈藏书家的敬慕，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和研究私家藏书的史料，并在前人著作体裁的影响下，写出了《藏书纪事诗》，从而开创了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著作体式，成为中国藏书史上的一部名著。

《藏书纪事诗》对上述三大史料堆的重视和开发是空前的。在关于自己扒梳史料方面的努力的一个回忆中，叶昌炽写道：“…窃不自揆，肄业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见有藏家故实，即裒而录之。”（《藏书纪事诗》七卷本自序）因此，近代学者汪闳评价道：“鞠裳先生撰《藏书纪事诗》七

卷，网罗前闻、捃摭逸事、搜扬潜德，闡彰之功，诚不朽矣！”（《明清**蟫林**辑传》自序）实际上，除搜集扒梳史料、汇成专辑之外，叶氏用力至深的是对这些史料的利用。叶氏的“昌炽案”，包含着叶昌炽的部分历史藏书学思想和观点，以及他研究雕版以来私家藏书史的成果，而这一切正是建筑在前人的史料记录和编集总结工作基础之上的。因此，《藏书纪事诗》贡献最大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作为一部专集本身多么地裨益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它对于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发创开先作用。在一篇关于藏书纪事诗的论文中，我曾这样写道：“……尤其可贵的是，《藏书纪事诗》为学术界开辟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发达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史料，令近代学术界不得不为之关心瞩目。于是，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藏书史的研究，由于叶昌炽的努力，从此开始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距叶氏定稿七卷本（1910年）行世不到二十年，一个在对《藏书纪事诗》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历史藏书的学术活动，便热热烈烈地开始了。有关中国历史藏书方面的专题论著在这一、二十年间断不断涌现，蔚为有世以来的大观。其著名者就可举出洪有丰著的《清代藏书家考》（1926—1927年），蒋镜寰辑的《吴中先哲藏书考略》（1930年），聂光甫著的《山西藏书考》（1928年），张彬和、查猛济合撰的《中国书史》（1931年），班书阁的《书院藏书考》（1931年），汪闳的《蟫林辑传》和《明清**林**辑传》（1931—1934年），杨立诚、金步瀛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1932年），吴晗的《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小史》（1932—1933年），何多源的《广东藏书家考》（1933—1936年），伦明的《续藏书纪事诗》和《辛亥

* 即《书城掌故藏家史，别有续篇在人间——〈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整理记》，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后收为《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一书的附录。

以来藏书纪事诗》(1936年),陈登原的《天一阁藏书考》(1932年),项士元的《浙江藏书家考略》(1937年),李滂的《近世藏书家概略》(1937年)以及郭白阳的《闽藏书家考略》(稿本),袁同礼的《宋、元、明、清私家藏书概略》(论文),《明清藏书家尺牋》(影印本),《常、昭合志·藏书家》(方志,1930年),《图书学大辞典》(工具书,1940年)等等。但这些著述殊少“旁通”、“会通”之作,几乎尽是私人藏书家的传记资料,囿于体例,终未能于藏书家史实中,考见出当日文化学术进退盛衰之迹。相比之下,《清代藏书楼发展史》(1935年)、《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年)便就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成为中国历史藏书研究史上的优秀作品。

可注意的是,以上所举这些著作,几乎都引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其书的重要参考文献,而且在著述上呈依据已有研究成果而推陈出新的可喜局面,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依据成果有序递进的历史阶段。如《藏书纪事诗》成为1932年结集的《两浙藏书家史略》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而《两浙藏书家史略》的研究成果,又成为1937年撰成的《浙江藏书家考略》的重要依据。至于1940年卢震京编集的《图书学大辞典》的藏书室传记词条,更是广泛地参考和利用了近代学者在历史藏书方面的论著,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权威意义至今未没,因此两年前台北又重印了这一部书。

这次学术研究活动是存在不少缺陷的。如前述及,三、四十年代的这些论著者在治学上缺少旁通和会通的思想,未能从中国历史藏书的兴衰中,研究出当日社会经济和文化学术的进退事实,更无论探讨中国历史藏书的发展规律了。这是近代史学方法论,尤其是历史藏书学方法论所造成的局限。此外,专题的研究也缺乏精细全面的精神。一般说来,近代论著普遍存在研究过程粗糙和研究专题狭窄的缺点。这固然同研究甫始的客观条件不足

有关，但也是近代学者学风不够严谨和方法论上存有缺陷所致。有成果可依的有序递进研究，一方面固然形成研究成果呈积累中递进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正由上述因素的制约，也带来了一些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如《藏书纪事诗》中“席鉴（玉照）”一篇“昌炽案”的误处（1891年），长期为《中国藏书家考略》、《常昭合志稿·藏书家传》、《江苏藏书家小史》、《蟾林辑传》、《图书学大辞典》等沿袭引用，直到1949年丁祖荫、徐兆玮等重修《常昭合志》时才得到纠正（参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因此，在这次历史藏书的研究活动中，并未出现能探讨中国历史藏书全面史实和发展规律的、初具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中国藏书史著作来。

第二次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活动的契机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印古代藏书史料和重版近代藏书论著。在这一阶段，以当时在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来的中华书局和在台北的出版单位贡献最丰。这时期的主要出版物有：《淡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吴兴藏书录》、《武林藏书录》、《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藏书十约·藏书绝句》、《颐宋楼藏书源流考》、《书林清话》（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经籍会通》（中华书局1958年版）、《广东藏书纪事诗》（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台北大华印书馆1968年影印本）、《藏书纪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版）、《藏书纪事诗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清代藏书家考》（香港中山图书公司出版）等，以及后来的《中国藏书家考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年影印本）、《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但是极其遗憾，由于时政对学界的冲击，这一良好的契机，在大陆和海岛两地均未及在现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形成活跃热烈的研究局面就夭折了。尽管时至今日，这些出版物还为研究中国历史藏书的当代学者们在资料上极大地仰仗着。

然而，当代学者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

究。以著名藏书家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云南腾冲人）的后裔、当代学者李希泌先生（同张椒华先生合作）于五、六十年代开始编集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正式出版（中华书局 1982 年版）为标志，一个方兴未艾的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学术活动，正在开发利用现代出版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地掀起。从已经取得的成绩看，它更多地显示着的似仍是基础研究阶段的特征，前人做过的许多工作尚为大多数研究者所继承发展者。要全面评价目前已有的成果和进展是困难的，但我们不妨就现状指出如下的一些特征：

1. 旧史料的整理继续受到重视。尽管中国历史藏书的史料编集工作，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史料的编集、总结和整理工作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的资料覆盖与中国历史藏书的丰富面相比，仍不免失之单狭，尤其是对古人记录下来的史料的搜集更未全面开展。国内长期致力于该项工作的，有河南的范凤书先生。他以近二十年的努力编集的《中国历代私家藏书资料汇辑》，稿本将近一百万字，如能完整出版，将有裨于私家藏书史的研究。《中国藏书家考略》经过近代学者俞鸿（运之）等校订近二百处、增加一百余人，使该书略臻完善，凡二十六万余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7 年正式出版。《藏书纪事诗》则业经现代学者、藏书家王大隆先生（1901—1966，字欣夫，江苏苏州人）增订甚多，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9 年刊行；随后可能推出的将有北京图书馆马同伊先生的同书校注本，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藏书纪事诗及其续著的整理工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吴则虞先生（1913—1977，字藕硕，安徽宣县人）的遗稿《续藏书纪事诗》十二卷已经整理成集，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王澐先生（1888—1969 字佩净、号瓠叟，江苏吴县人）的遗稿《续补藏书纪事诗》一卷则经由李希泌先生经手整理出版（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遗憾的只是择本不佳，印本错讹在一百

处以上。至于根据《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及其它一些藏书纪事诗校注增补的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合集，则定名为《续补藏书纪事诗传》，与译本《清代藏书楼发展史》合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印行。往往地，史料的大规模的汇编和整理，是一次活跃的研究活动的充要条件。本集《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的另一编旨，就在于推波助澜，为高等学府的爱好者们提供一部足资浏览的优秀读本，吸引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

2.专题研究工作充分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除了传统的皇家、私家、书院藏书三大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化外，许多论文的研究触角已深入到佛藏、道藏、寺院藏书等领域，而征书、藏书题跋、藏书目录、藏书思想、藏书保护、藏书流通、藏书史著作、藏书家个体史等专题也倍受重视。1982—1987年的大多数论文属于此类，但是蔚成专著的不多。有个别写成了专著也未能正式出版，如钱亚新先生的《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仅有1981年江苏图书馆学会的内部铅印本；正式出版的就只有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伟章、李万健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两种了。

3.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方法论亟需改造创新。目前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学者在方法论上大多处于袭用旧法阶段，表现为受传统束缚至深：用力至勤而成果不大，方法论上改造纳新的气象不明显，研究怀抱上呈闭锁状态。仅从研究专著的题名上，就可略窥一斑：范凤书先生对其编集的史料集的题名曾经考虑过四个以上，如《中国历代藏书家资料汇辑》、《中国私人藏书史资料汇辑》、《中国历代藏书家考略》、《中国藏书家辞典》等等，同该书编旨、体例均不够切合。后经我提议，最后才确定为《中国历代私家藏书资料汇辑》的现名。而苏州大学瞿冕良先生的关于江苏常熟这一藏书之乡所产的抄书家、刻书家、（刻工）和藏

书家的学术传记资料书的题名，则更为传统典雅，称为《琴川书史》。我无意于批评这种现象，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从题名的设计上，可看出当今学者研究思路上的因循。无疑地，研究上的集成、开拓和创新是当代史学的特征，也应该成为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追求方向。而集成、开拓、创新的成果的取得，首先有赖于研究怀抱上的开放涵容和研究方法论的改造创新。一些论文的成功实践证明，数学统计方法、图表例示方法、模型方法、调查方法、黑箱方法、文化地理方法等，可能成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目前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引进和探索太少了。

4.追求不高、自范不严，缺少以中国藏书通史专题史乃至自任的研究者。众所周知，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更旺先生（1932—1986）经年来致力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断代藏书史的论文，很见扎实的功底和谨严的学风。值得痛惜的是，这位专家的不幸病逝，使我国学术界失去了由他编写出一部初具中国藏书史雏形的史著的机会。我们赞许李先生那样的研究，专题论文应当具有明确的目的论。而1982年由中华书局推出的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的许碕生先生编撰的《古代藏书史话》，实际上仅是中国藏书史的一部概而又简的通俗读物。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作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用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经过1986年10月的专家审稿会的反复推敲，在主编谢灼华先生率领的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下，颇见水平。虽然这部书同我们理想中的《中国藏书史》距离还很远，但我衷心希望，这部书的公开出版能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起到指导和启发的作用。

台湾学术界对中国藏书史、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也不够活跃，为台湾用作高等学府教科书（大学用书）的《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再版）中关于中国古代藏书的一章文字（周骏富撰），十分概略也无特别

创见，后收入《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王秋桂、王国良编，台北明文书属 1983 年初版）；而林庆彰先生为《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学术篇》（刘岱总编、林庆彰主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3 年修订版）专撰的介绍我国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的《知识的水库》一篇长文的学术水平，似也未出周骏富《中国图书馆简史》之上。在论者所知见的该方面的论著中，只有苏精先生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年初版）和宋建成先生的《清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1972 年）两书显示了当代研究水平，因此是值得推荐的专著。*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自然辩证法》）无疑地，我国历史藏书事业的实践，贯穿着一种由朴到华、由简到繁的理论思维。因此，研究中国历史藏书，除了要研究关于藏书的“措置之术”，即有关藏书的图书访求、整理入藏、编目分类、庋藏保管、传承传播的事业发展史外，还要在广阔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背景上，来研究在这些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的思维”。纵观近二千年，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应用以来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藏书发展史，中国历史藏书学的发展是充分的，是无愧于立足中国学术之林的。

在谈到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的问题时，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曾经这样指出：“各种科学的形成，每种科学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乃是出于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需要，每个时代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从某种程度看，科学的历史必须是目的论的，即是说必须归结于现代；因为问题在于从其发展中来理解现代。”（《地理学》序）然则中国历史藏书事业历经 1911 年以后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和私家捐书活动，经过

* 关于《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的价值，可参徐雁《我国近代私家藏书的历史终结——论台湾传记文学版〈近代藏书三十家〉》，载辽宁省图书馆《图书馆学刊》1986 年第 4 期。该文也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秋禾书话》之中。

1949年以来近四十年间的过渡，在大陆本土业已形成断层；历史中国关于藏书的“措理之术”，对于当代图书馆的藏书事业，既无直接借鉴作用，而历史藏书事业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业已发生本质的变化，似无重大时代意义，那么，中国历史藏书还有什么研究价值呢？这个问题提得恰切。

对于这一疑问，我曾有过一篇专论予以回答。尽管经过三年来的研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却仍是一致的：“古代藏书学的一切研究活动，是以编撰中国藏书史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弄清中国古代藏书的历史发展事实，总结古代藏书的优秀文化传统，介绍其文化学术史地位，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学总结价值所在。”* 兹将具体思想阐述如下：

（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可为史学界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如果以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史研究的“直通”（精确而具体地划分中国历史社会的各个阶段并加以纵向研究）、“旁通”（将历史社会各阶段的各种现象有机联系起来的横向研究）、“会通”（历史社会各个方面纵横结合的综合研究）的史学思想（参《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来检讨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现状，那么中国历史藏书研究的薄弱，是不言而喻的。即以在研究私家藏书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而言，仍存有许多缺点。学者曾指出该书在“直通”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盖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学者于此，可见人文进展之迹焉。有清之季，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起自宋代，犹非穷本探原之笃论欤。”（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换言之，至少在私家藏书史方面，“穷本探原”的直通研究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更何况《藏书纪事诗》本身的收录还确存有不少讹误遗漏。至于

* 即《我国古代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藏书学述略》，载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关于皇家、书院藏书制度史，佛藏、道藏事业史，儒藏思想史等的研究则更少为人重视，即研究断层极多，亟需接续。而从“旁通”、“会通”的要求而言，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更存在大片的空白，亟需弥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从事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真是大有可为。这是因为，在历史中国，由于幅员的辽阔、自然的差异，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历史藏书事业发生、发展、发达的过程和布局曾经发生过极大的影响。这一些只有在广阔的中国史背景上，予以综合研究，才能研深究透。也只有通过如上这样的研究，才能弄清中国历史藏书的发展史实和规律，才能有助于后人对历史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了解，才能有助于学者对中国文化史的完整认识和历史文化规律的科学把握。因此，中国历史藏书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前途的。

（二）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成果，可为文化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所借鉴。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同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势必要吸取以上诸史的研究成果，而它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势必可为它们所借鉴。历史社会的各种事象之间，本身是互为制约的，那么也只有通过对互为制约的各种事象进行旁通研究，才能完成会通研究。因此，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对于文化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学术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藏书在功能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意义是，它是历史中国社会文化产品积累、保藏、整序、传播和创造的重要系统。假如没有藏书家们日益自觉地从事收书、藏书、钞书、校书、借书、刻书等活动，那么我们如今很难继承有那么庞大的文献和文化遗产，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史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藏书事业的悠久发达在全世界各个国度中是独一无二的。藏书活动作为昔人一种日臻自觉的行为，它除了受经济、文化、政